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学校中的当代问题社区:批判性地探索教育方法在健康方面的力量，健康与体育

本章深入探讨了学校社区中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教育方法的影响力,这与课程、教学和学习、社区和学校的实施密切相关（参见图1.2）。从英格兰现行的国家体育课程中可以提炼出三个关键的历史和背景主题:健康主义;对运动的固有观念;以及对社会和文化影响因素的认知。前两个主题与行为主义哲学相关,该哲学将身体视为需要控制的对象。第三个主题则采用建构主义方法,强调“意识”。对社会和文化影响因素的认知与整体教育,特别是体育教育的社会文化方法密切相关。

Pringle、Larsson 和 Gerdin (2019) 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Stirrip和 Hooper 特别指出,目前亟需“更加关注如何将批判运动从研究转化为实践” （2022,第 1 页）。因此,本章将批判性地探讨学校社区在实施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方面存在的当代问题,揭示在选择教育方法时平衡和意识的重要性。

Stirrip 和 Hooper 并不否认许多年轻人在体育课上有积极的体验,但他们认为“我们不能忽视

© 编辑（如有)和作者,由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独家授权,2024 年。T. Lynch， 《体育与福祉》，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72874-7_8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大量证据表明,许多人并不认同这一点” （2022,第1页）。有研究表明,目前的健康教育受到肥胖话语的引导（Quennerstedt等人， 2010） ,并且“复兴了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健康观念”（Alfrey & Brown， 2013,第160页）。在英国,健康与体育教育的关系根植于身体层面，“体育教育与健康的关系由来已久,并被普遍接受,因为它为年轻人提供了定期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并让他们了解积极生活方式带来的健康益处”（Cale & Harris， 2023,第2页）。

关注健康的身体层面是批判教育学的核心。“围绕身体、健康和体育活动的批判性研究在体育教育（PE)学科中有着悠久的历史。

此类工作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例如,Kirk,1986;Kirk & Tinning,1990; Tinning,1985）,并且（可以说)此后一直持续存在（Stirrip & Hooper， 2022,第1页）。一个例子是,英国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们被告知他们需要锻炼,否则就会变胖。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将身体视为需要训练的对象,都会给孩子、家长和学校社区带来压力,而且往往会影响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正如Cale和Harris （2023,第5页)所述，“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普遍存在也导致人们担忧,健康促进的目标对于该行业而言难以实现”。本章将探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从英国（英格兰)小学低年级开始,通过考察教育和健康方法;在本例中,重点关注“以成绩为导向的课程及其伴随的行为主义倾向”。教学方法”（Thorburn等人， 2011,第393页）。这种占主导地位的行为方法揭示了英格兰体育国家课程表象之下隐藏的信息（话语）。更深入的调查显示,它不仅存在于体育课程中,也存在于教育部（DfE)对学生福祉的监管中;具体而言,就是Ofsted对学校的检查（Jeffreys， 2023）。

有人认为,这种话语在社会中经常存在而未受到挑战,并且对课程所宣扬的“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利影响（Cale & Harris， 2019）。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隐藏信息

英格兰东南部一些公立学校的学前班（Reception)学生收到一封信,称他们超重。这是因为在英国，“根据政府的全国儿童测量计划（NCMP），学前班和六年级的学生都要测量体重和体质指数（BMI）”（Ford， 2018）,尽管人们普遍认为BMI并非衡量体脂含量的完美指标（WHO， 2024）。此外,反馈信中还将孩子的体重与癌症等危险疾病联系起来,并建议家长带孩子去看全科医生（Nnyanzi等人， 2016）。这种采用医学模式的健康方法已经过时,Nnyanzi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家长们认为这种方法不恰当,引发了争议和愤怒,但这种情况至今仍然存在。

英国政府认为：

> 国家肥胖监测计划 (NCMP) 的实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使地方政府及其合作伙伴能够规划并投资于关键服务,以应对肥胖及其更广泛的决定因素。它还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提高家长对超重和肥胖、其后果以及健康生活方式选择的认识。（英国健康改善与差异办公室， 2024 年）

这种将医疗模式应用于健康领域的方法是治理术的一个例子（参见第43页）；“治理术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策略来塑造个人和群体的行为”（Tinning， 2010,第147页）。这种方法有三个主要批评（参见第三章,第45页）：

1. 它支持健康领域二元论的错误观念,即生物问题和心理问题被分开对待;2. 它过分关注残疾和功能障碍,而忽略了……

   个人的能力和优势;以及
3. 它助长了医学中的家长式作风,而不是赋予患者权力（Swaine，2011）。

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家长对错误和过时的做法提出质疑。这不禁让人质疑教师和学校领导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教育方法和实践显然还不够。

> 地方当局需要思考,将儿童体重问题描绘成一个医疗问题并引导他们寻求全科医生服务是否是最明智的做法。本研究及其他研究表明,家长/监护人和儿童更多地将儿童体重问题视为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地方当局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来改变更广泛的社会环境 摒弃“健康问题”的标签,并提供更全面的方法来改善居民的体重状况。(Nnyanzi et al., 2016)

例如,肯特社区卫生(NHS基金会信托)的一封信函告知家长,根据国家儿童测量计划进行的测量结果,他们的孩子体重超标,与其年龄、性别和身高不符。此外,超重的儿童往往会成为超重的成年人(肯特郡和东萨塞克斯郡学校健康与免疫服务负责人,致家长信,2016年11月16日)。

另一个例子是,多塞特郡一名11岁的女学生黛西在收到同样的“肥胖信”后“失去了自信”,并且“感到痛苦和愤怒”。她的母亲事先并未被告知该项目,也不知道女儿会在学校被称重。黛西表示,读完信后,她觉得“因为我胖,所以我无法融入其他打板球的人”。结果,黛西开始不吃早餐,并且花了数周时间才重新开始打板球(Ford,2018)。在萨福克郡一所小学的免费暑期学校俱乐部广告中,也明显体现了对身材形象的压力。这些俱乐部被列在OneLife Suffolk网站上西萨福克郡体重管理小组的名单中。广告上写道:“为 4 至 14 岁有体重问题的儿童提供充满乐趣的俱乐部”,2016/2017 年,“超过 200 名儿童及其家庭成功完成了我们的儿童体重管理计划”(One Life Suffolk, 2017 年)。

尽管在每种情况下,传递信息的目的可能都是好的,但教育者需要识别并解决青少年究竟接收到了哪些信息的问题。Cale 和 Harris (2019,第 11 页)指出,“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是如何推广、解读和接受有关体育活动和健康的建议。”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由教师、卫生专业人员和家长共同制定”。因为这些话语和意识形态并未记录在学校课程文件中，“而是通过社会中的各种媒介进行教授和学习，通常被称为‘隐性课程’”（Lynch， 2017，第80页）。被免费暑期学校俱乐部认定为“胖”的孩子会有怎样的感受？这个标签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此外，这也引发了家长们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的问题。例如，肯特社区卫生中心寄回家的一封信让接待班孩子的母亲心烦意乱，并开始质疑自己的育儿能力（个人交流，2017年6月20日）。此外，黛西的母亲质疑为什么没有对孩子的健康状况进行全面评估；“你没有机会说明你在家里做了什么，或者你的孩子在运动方面做了什么”（Ford， 2018）。

2012年伦敦奥运会对英格兰体育课程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格里格斯（Griggs，2015）将此现象称为“顺便一提的政策”（Dery， 1998），并进一步解释说，这种联系体现在“主流话语和修辞被推崇和允许，而人们往往并不理解其是否恰当或可能产生的影响”（Griggs， 2015，第38页）。本章通过探讨相关文献，对“恰当性”和“影响”提出了新的见解，并加深了理解。因此，可以说，目前英格兰的体育课程强调将身体视为客体，而非关注“完整的”儿童。也就是说，体育课程深受教育和健康领域自上而下的行为主义政府方法的影响；这种方法是刻意、系统、有计划地改变行为的尝试。 Leahy、O Flynn 和 Wright 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将课程称为政府集合体（2013）。因此，它迫切需要平衡各种方法，最好是以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方法为主导（Stirrip & Hooper， 2022）。

因此，本章指出，优先采用行为主义方法会对许多儿童的身体发育和福祉产生长期和短期的不利影响，亟需改变。运用批判教育学，“可以对教育系统和社会中显而易见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进行质询、揭露和挑战……从而阐明某些个体在特定背景下被边缘化或排斥的原因和方式”（Stirrip & Hooper， 2022，第1页）。在探索国家话语体系背后的深层含义时，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英国体育课程中,出现了两个关键的历史和背景主题/问题:

“健康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体育
运动真的能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培养孩子的性格吗?

“健康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纵观历史,体育教育有着不同的指导原则或目标,这些原则或目标通常受到政府或社会需求的驱动。Arthur等人（2015,第429页)将其称为学科哲学,即“支撑实践的信念和价值观”。如前所述,历史上,体育教育受到两种哲学的影响:

1. 将身体视为客体（与教育中的行为模型/效率（自上而下）/治理/健康中的医学模型和健康中的行为模型有关）。
2. 整体观;身体、心理、精神和福祉（Lynch & Soukup， 2016） （与过程/人本主义视角/建构主义方法/跨维度学习/社会健康模式相关）。

从将身体视为客体的角度来看,体育课承担着训练身体的责任;它旨在培养“受控的身体,使其具备符合特定社会可接受的社会行为标准的能力,并在经济体系中做出生产性贡献”（Kirk， 1993,第13页）。Tinning和McCuaig指出,在许多国家,这通常与体育训练有关,旨在培养特定类型的公民（2006）。此外,人们也“认识到身体和体育活动在社会权力行使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Tinning等， 1993,第79页）。

根据林奇和苏库普（2016)的研究,许多论述都影响了“身体作为客体”的哲学。健康主义被定义为“一种信念,即健康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和自律轻松获得,而这些努力和自律主要针对调节身体的大小和形状”（克劳福德， 1980,第366页）。因此,健康问题被视为个人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和环境因素。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影响因素 与健康领域的医学和行为模型有关。
从本章引言中描述的情景来看,健康话语以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健康主义”(社会中被接受的信念)都以被称为“肥胖流行病”的长期危机为基础。

> 青少年参与健康主义话语可能会受到一些好心但准备不足的教师的影响,这些教师自身对健康、体能和体育活动的看法狭隘而片面。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学校在促进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方面远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Cale & Harris， 2019，第13页)

过去60年来,肥胖危机日益加剧,其根源在于生物医学研究专家;而体育教育领域的专业和学术文献(以及社交媒体)又将其重新解读,以论证该学科的重要性。随后,多年来一直有人认为,肥胖危机往往会在社会上引发恐慌,导致政府和媒体将责任归咎于家长和学校(Gard， 2006； Gard & Wright， 2001,2005)。

根据斯坦贝克的研究,小学体育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身体活动不足和儿童肥胖问题上(2001)。加德和赖特(2001)警告说:体育课中对肥胖论述的盲目接受会加剧对身体的焦虑;会滋生一种责备文化,剥夺参与体育活动的乐趣;此外,还会边缘化那些不被认为“燃烧脂肪”的体育活动;并对高等教育和中小学体育课的研究和教学方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迫切需要提高青少年在学校健康学习的广度、深度和相关性”(凯尔和哈里斯， 2019，第13页)。加德和赖特(2005,第13页)提出,“‘肥胖流行’理论的科学基础远不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确定”;比德尔等人(2004)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相关证据并不令人信服。

促进健康“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因为他们需要承担与公民健康相关的各项费用,尤其考虑到运动不足性疾病的影响以及大量研究表明体育锻炼与健康之间存在密切关联”(Lynch， 2013,第258页)。然而,健康主义形成了一种信念,使那些不符合“运动=健身=健康”三元组的人感到内疚(Kirk & Colquhoun， 1989)。因此,外貌在健康主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背后是对理想外貌的评判以及人们如何符合这种标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符合社会期望。“就像剧本一样,身体向我们讲述了它所代表的人的故事,它们传达了一系列思想和价值观”(Kirk， 1993,第 7 页)。

健康主义与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内疚感有关。
“电视节目《减肥达人》是健康主义的典型例子,它将身体与道德自律的行为联系起来,如果人们被认为缺乏自律,就会感到内疚”(Lynch， 2017,第81页)。这类信息通过所谓的“隐性课程”传递给孩子,正如本章开头提到的学前班和六年级学生的例子所示。

有人认为这通常是无意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教师已经习惯了这些信息,以至于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信息的存在(Lynch， 2017)。

可以说,英国国家课程鼓励健康主义,尤其是在“学习目的”中明确指出:“体育课应为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以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方式建立身体自信”(英国教育部，2013,第1页)。正如本文引言中讨论的案例所示,这种体育课程的后果之一是,学前班和六年级的学生开始担心肥胖,被贴上超重的标签,甚至有校长允许学校里成立“肥胖俱乐部”。因此,教师和学校领导需要接受相关教育,了解这些意识形态的存在,并学习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应对它们。

针对肥胖危机,加德警告说,教师们的一些应对措施,例如前文提到的那些不良案例,表明他们缺乏专业思考,甚至可能违反职业道德。此类做法不太可能对人口肥胖或健康水平产生任何“可察觉的影响” (2006,第79页)。目前英格兰的体育国家课程被描述为“以表现为主导的课程,并伴有行为主义倾向的教学方法”(索伯恩等人， 2011,第393页)。此前的一份国家课程草案声称采用整体方法,并恰如其分地命名为“理解身体发育、健康和福祉”,但随着2010年政府换届而被废弃。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体育运动在小学低年级阶段能培养孩子的品格吗?

如前所述,英格兰现行的国家体育课程受到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影响。奥运会闭幕后,首相戴维·卡梅伦发表声明称:“任何新的国家体育课程,如果遵循奥运会的指导,都将‘要求每个小学生参加足球、篮网球和曲棍球等竞技性团队运动’”(Griggs, 2015,第38页)。Griggs指出,该课程将体育置于主导地位(2015),并且“对比赛,尤其是竞技团队的日益重视,如今已渗透到小学一年级”(2015,第40页)。

这些细节表明,最新的课程政策可能助长了诸如体育、性别歧视和精英主义等话语和意识形态,因此需要教育工作者加以识别和应对。此外,如果教师培训方面的教育不足,那么这些意识形态很可能正在影响儿童,甚至在他们更小的年纪就已开始影响。不幸的是,这令人担忧,因为格里格斯(Griggs)指出,英国小学体育课的教学效果不佳(2012),从而增加了滋生这些不良思想的机会。彭尼(Penney,2022)也支持这一观点:

> 斯特拉普和达曼特重申,教育政策 尤其是与健康和福祉相关的政策 至少在英国远非中立。它反映了主流的政治和社会议程,包括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推进,并且旨在通过正规的小学和中学教育以及学前阶段的非正式教育来促进这些议程。

在解读英格兰国家体育课程 第一阶段政策时,学习目的表明,所培养的公民理想情况下是奥运冠军;他们“受到启发”,在“竞技体育和其他体力要求高的活动中取得成功和卓越成就”。

(英国教育部, 2013,第1页)。这种理想的问题在于,对大多数男孩女孩来说,它并不现实,因此具有排他性。科恩阐明道:“竞争的结构是为了产生一个冠军和更多的失败者”(1992,第109页)。正如这些情景所揭示的那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本章引言部分阐述道,不幸的是,对于许多孩子来说,失败在他们甚至可能还没开始第一阶段学校课程之前就已经被强化了。

这份国家课程大纲就是一个体育话语的例子,它“形成了一些关于体育教育和运动的固有观念,但这些观念并非总是正确的”(Lynch, 2017,第82页)。此外,国家课程大纲的“学习目标”还指出:“参与体育运动和其他活动的机会能够塑造品格,并有助于培养公平和尊重等价值观”(教育部, 2013,第1页)。教育工作者应该对这些说法提出质疑,而不是盲目接受。

考虑到目前在资格认证、教师培训和体育教学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期望所有在校儿童都能在竞技体育中取得优异成绩是否现实?参与体育运动真的能培养每个孩子的品格吗?公平和尊重是否能为所有儿童带来益处?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论述中处于什么位置?又该如何应对?

正如英格兰国家体育课程大纲“学习目的”所强调的那样,体育运动是体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们常常误以为体育课仅仅是体育运动。这会让幼儿教育者感到困惑,因为幼儿的运动控制能力尚未发育成熟,无法将多种运动技能与游戏规则和策略结合起来。用学习阅读来类比,让孩子直接参与复杂的游戏,就好比用小说来教幼儿拼读 这不符合他们的发展阶段。

关于体育运动和体育课的课程描述,例如英国课程中体育课学习目标部分所列的描述,都是基于假设。虽然有些孩子可能通过体育运动获得这些结果,但对许多孩子而言,这些描述与他们的实际情况相悖;而教师教育的不足更加剧了这种矛盾。简而言之,这些描述并非基于研究证据。

希基认为,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常见误解包括:

- 通过参与体育运动,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养成积极的健康生活方式态度;
- 友谊、团队合作、分享与协作是参与体育运动无可争议的体现;
- 只要你愿意努力奋斗并做出必要的牺牲,你就能实现你的目标;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 确保男孩和女孩获得平等的机会和认可。
（1995年,第5页）

这些假设是理想状态,可以通过高质量的体育教学实施来提升,因为“研究目的”指的是高质量的体育课程。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教师能够有效地实施这些课程（Lynch，2005）。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有观点认为体育作为一门学科可能存在脆弱性（Tinning等，2001）。在英国,高质量的体育教学一直备受争议,因为有大量文献表明,大多数教师在体育教学方面准备不足（Griggs，2012,2015；Lynch，2015；Lynch & Soukup，2017）。文献指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高质量体育教学五大支柱中的第一项 ‘教师教育、供给和发展’方面,英国似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Lynch & Soukup，2017,第8页）。此外,体育课也是唯一一门经常由体育教练教授的科目;不要求教师资格,也不要求有合格的教师（Blair & Capel，2011；Carney & Howells，2008；Smith，2013）。

这进一步强化了科恩对国家体育课程预设假设的批判。相反，“竞争会拖垮我们,摧毁我们的心理,毒害我们的人际关系,并干扰我们的表现”（科恩，1992,第114页）。科恩将体育运动和竞争的倡导置于“将身体视为客体”的体育理念框架内,这种理念与为特定类型的公民进行身体训练密切相关：

> 换句话说,体育不仅仅塑造性格;它塑造的正是对社会体系最有益的那种性格。从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从那些从中受益并主导体系的人的角度来看 让人们彼此视为竞争对手是有益的。（1992,第85页）

他断言,并非所有孩子都喜欢竞争,并将竞技体育称为失败工厂,它不仅淘汰了“坏孩子”,还让许多“好孩子”失去了兴趣（1992）。

这一论点尤其引人关注,因为 2015 年威尔士学校调查（涉及近 1000 所学校的 1100000 名威尔士学童)发现：“让体育运动和身体活动变得有趣和令人愉快,对于提高儿童和青少年的参与度至关重要”（SportWales，2015）。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或许科恩反对竞争的观点能引起英国儿童的共鸣,因为文献证实,英国的体育课未能有效激发学生在校期间的体育兴趣,也未能鼓励他们在校外积极参与体育活动（Griggs & Ward, 2012; James & Brophy, 2019; Sandford & Rich, 2006）。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2016)开展了一项名为“参与”（Taking Part)的英格兰全境调查,研究了5至10岁儿童参与体育运动的情况。2015/16年度的调查结果（1096名参与者)显示,2016年7月，“与2008/09年度或2014/15年度相比,各年龄组（5-15岁、5-10岁或11-15岁)儿童参与体育运动的比例均未发生显著变化”。这表明,英格兰新的体育国家课程以及政府向英格兰体育局拨款10亿英镑用于基层体育运动,并未带来任何改善（英国广播公司[BBC]， 2017）。基于这些最新发现,我们认为有必要且及时地采用一种全新的、整体性的体育教育方法。建议在学校早期阶段,运用整体性的社会文化方法来解决不受欢迎的意识形态问题　本书多次提及此观点,并在第十章进行了详细探讨。

文献回顾表明,体育课多年来有着不同的目的,而这些目的都源于政府或社会的需求。目前,英国国家体育课程的制定是为了培养奥运冠军和年轻的竞技运动员。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因为深入分析表明,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它都可能违背其“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的目标。这引发了人们对四岁儿童在小学一年级可能接收到的潜在信息的思考;这些信息可能会对儿童的全面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本章旨在平衡英国国家体育课程中所呈现的观点。为此,本章建议教育者应意识到影响体育和运动的现有社会文化因素。我们需要识别各种话语和意识形态;阐明这些话语的立场或背景需求,同时也要指出其不良方面。儿童是话语和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因此,从小学阶段开始,就需要让他们意识到自身选择的重要性。社会文化方法要求教师接受相关培训,了解这些因素以及如何更好地应对它们。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简而言之,英格兰体育课程的国家课程在设计和实施方面可以而且需要改进。Cale 和 Harris (2019, p. 13) 也支持这一观点：

> 尤其是在体育课上,学习应该挑战许多青少年（以及教师)对健康、体能和体育活动的狭隘认知、误解和错误观念。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能需要开发替代方法，无论是在职前教师教育中,还是在与健康体育教学法相关的专业发展中。

发展学校社区福祉

为了发展和优化学校社区的福祉,鉴于近期发生的事件,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对学校的检查需要在设计和实施方面进行改进。此外,还应挑战目前对学校社区心理健康和福祉的狭隘关注、误解和错误观念,这应从教育权力层级顶端的Ofsted检查员（行为方法)开始,逐步向下延伸至校长、教师和其他教职员工。正如前文所述（参见第二章第32页）,目前学校社区的教师福祉存在诸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已经存在多年。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他职业相比,教师报告的职业压力和职业倦怠程度最高（Henebery， 2024）。

在调查导致校长露丝·佩里（Ruth Perry)不幸去世的种种情况,并思考其对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未来发展的影响时,很明显,英格兰教育部（DfE)需要继续推进其向以研究为导向的实践（建构主义方法)的转变。这一转变始于2017年,由时任首席督学阿曼达·斯皮尔曼（Amanda Spielman)领导。斯皮尔曼认为,这是平衡问责制体系的关键所在（参见第31页）。由此,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为主义政府监管方式开始向更具建构主义（以研究为导向)的Ofsted对“教育者”的监管方式转变。因此,为了使这一转变继续朝着建构主义方向发展,建议将所有Ofsted督学都要求具备教育研究方面的资质 至少拥有研究型高等学位,理想情况下拥有博士学位。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调查已正式认定,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的检查是导致校长露丝·佩里死亡的原因之一。验尸官的报告警告说,除非做出改变,否则可能会发生更多此类死亡事件；“我认为,如果不采取行动,未来仍有可能发生类似的死亡事件。”

（法院和审裁处司法部门， 2023年,第2页）。建议的改革措施,为防止教师遭受痛苦或发生更多死亡事件,应继续加强教育研究以及实践教学经验。新加坡教育体系（经合组织， 2023年)正是这种改革的典范,然而,英国目前尚无此类改革。就目前而言，所有督学仅需持有合格教师资格（QTS）,而该资格在一些西方国家并不被认可为学术资格（参见第11页）。

验尸官的报告特别指出了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和教育部需要关注的七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尤为突出,它指出“英国教育标准局几乎完全缺乏相关培训或已发布的政策” （2023年,第2页）,即督察员在检查学校领导是否出现焦虑迹象时，如何应对此类问题,例如暂停检查或在检查过程中召开会议。

随后,第三个担忧指出“Ofsted检查的部分内容缺乏公平、尊重和敏感性” （2023，第2页）。这第三个担忧引出了一个问题：“Ofsted的检查是如何监管的？”如果Ofsted像教育研究人员一样受到伦理审批的约束,那么他们的流程就能更好地进行公平和尊重的检查。

研究伦理委员会（REC)有助于营造健康的科研文化。
他们负责审核研究提案,确保高标准的伦理规范,保护研究参与者的权益,同时促进研究诚信（英国研究诚信办公室， 2024）。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没有研究伦理委员会（REC）,虽然他们有一份政策文件,但其中明确指出，“该政策不适用于任何有直接法律义务收集数据的人员,例如作为Ofsted职责范围内服务检查和监管的一部分”（Ofsted， 2019）。由于缺乏研究伦理委员会,Ofsted对学校的检查工作中缺少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和质量保证环节。这一缺失环节与验尸官的关注点直接相关。因此,具备深厚研究知识的检查员显得尤为重要。

最直接的变化是撤换了任职七年的首席督学阿曼达·斯皮尔曼,由马丁·奥利弗爵士接任。奥利弗上任第一周就对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应对疫情的措施展开了内部调查。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露丝·佩里去世。此外,他还通过将Ofsted检查推迟两周,以便检查员参加心理健康意识培训来应对这一问题。斯帕克斯（1991)将此举描述为第一级,即表面改变　然而,研究警告说,除非所有三个层面都得到显著建立,否则只会带来表面上的改变。

深入分析校长露丝·佩里（Ruth Perry)的验尸报告可知,教育界只有在教育标准局（Ofsted)和教育部（DfE)将教育方法从行为主义转向建构主义后,才能取得进步。这需要彻底的变革,而非治标不治本的表面功夫,例如速效培训或政策文件。全面实施的创新或改革“需要对过程的理解,以及一种无法用任何步骤清单概括的思维方式”（Fullan， 2001,第71页）。因此,教育标准局需要基于教育研究知识和实践教学经验进行改革。此前已有关于英格兰学校督导员、校长和教师培训、所需经验和资格的担忧（参见第32页）。

如前所述（参见第二章,第31页）,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历来依赖于来自成绩表和最低标准（例如SATs)的定量数据。这在教育领域令人惊讶,因为通常用于学校研究和课程研究的是定性数据所提供的更丰富、更多样化的见解。“课程源于社会活动。它的设计既服务于当前目标,也服务于未来发展目标。”

课程是一个动态领域”（Ornstein & Hunkins， 2017,第1页）。定性研究者通过成员核查和三角验证等数据收集方法,以及数据分析和报告,来建立研究的可信度和可靠性。然而,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目前仅使用效度、信度和普遍性等定量研究术语（Kervin et al.， 2006）。因此,如果督察员接受定性研究方法和术语的培训,那么可以预见,Ofsted的研究方法也会随之发展,尤其是在情境和经验方面。如此一来,督察员就能提供更丰富、更准确的学校评价。

朱莉娅·沃特斯教授（露丝·佩里的妹妹)认为有必要改变方法：“我们一直推动的是,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需要进行真正彻底的变革,系统性的变革,文化上的变革　而这次培训仅仅是个开始”（Standley， 2024）。因此,英国教育标准局需要掌握更多关于教育研究的知识,理想情况下,还需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同时具备教学经验的督察员。此前曾有人提出对学校督察员的培训、经验和资格表示担忧，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关注的核心问题（Lynch， 2023）。

Coffield (2017;参见第30页)指出的Ofsted长期存在的问题，最近又因Ruth Perry的去世而得到补充。如果设立了研究伦理委员会（REC），并且所有督察员都能证明其具备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知识，或许这场悲剧就能避免。Ofsted必须继续推进其始于2017年的循证实践之路。此外，强烈建议Ofsted设立研究伦理委员会，并确保督察员具备教育研究方面的资质，即硕士或博士学位。因此，根本问题无法通过培训解决，而是与教育领域普遍采用的行为主义方法有关。解决之道在于为所有学校社区成员的健康和福祉采取整体性的方法。

综上所述，学前班的孩子们应该享受运动的乐趣，因为这是他们的天性。教师（需对影响身心健康的社会文化因素有深刻的理解)应充分利用这一点，以此作为促进他们在各个领域学习的媒介。他们不应该因为害怕变胖而运动，也不应该因为达不到成年人对“健康”的期望而感到内疚。将儿童归类为超重是错误的，学校领导不应允许这种情况在学校发生，也不应允许督学对学校社区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建议英国教育部和教育标准局在英格兰国家课程的体育和身心健康部分，采用建构主义、整体性的社会文化方法，并将其应用于所有课程领域。这种方法应注重“全人”理念：身、心、灵、福祉。

反射

本章探讨课程文件中未明确列出的隐性信息。结合你的实际情况，肥胖是否是一个问题？如果是，是如何解决的？学校是否对儿童/学生施加了成年人的健康期望？如果是，是如何施加的？在你的学校里，体育运动如何帮助每个孩子塑造品格？体育运动如何促进所有孩子的公平和尊重？学校领导如何意识到影响学校社区成员福祉的负面影响？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以社会文化为导向,注重身心整体理念（包括身体、心理、精神和福祉）,并结合您所在社区的实际情况进行阐述?

参考

Alfrey, L., & Brown, T. (2013). 健康素养与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权宜之计还是赋权过程?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 4(2),159-173。

Arthur, L., Beecher, B., Death, E., Dockett, S., & Farmer, S. (2015).幼儿教育环境中的编程与规划（第6版）。Cengage Learning。

Biddle, SJ, Gorely, T., Marshall, SJ, Murdey, I., & Cameron, N. (2004)。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问题与争议。英国皇家健康促进学会杂志， 124 （1）,29-33。https ://doi.org/10.1177/146642400312400110 Blair, R., & Capel, S.

(2011). 小学体育教育、教练和继续专业发展。体育、教育与社会， 16(4), 485–505。

英国广播公司（BBC）。(2017）。奥运遗产:2012年奥运会后投入的10亿英镑是否让更多人参与体育运动？ 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40817063

Cale, L. 和 Harris, J. (2019)。在学校推广积极的生活方式。香槟市，IL:Human Kinetics。

Cale, L., & Harris, J. (2023).健康体育教育教学法。Routledge出版社。

Carney, P. 和 Howells, K. (2008)。小学体育教育专家。体育教育要事， 3(3),3-4。

Coffield, F. (2017年11月2日)。支持和反对Ofsted的研究证据。BERA博客。https ://www.bera.ac.uk/blog/the-research-evidence-for-and-against-ofsted法院和审裁处司法机构。(2023年12月19日)。Ruth Perry:《预防

未来死亡报告》。检索自Ruth Perry:《预防未来死亡报告》 法院和审裁处司法机构。

Crawford, R. (1980). 健康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医疗化。国际健康服务杂志,10,365-389 。

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2016)。 《2015/16年度儿童参与报告》。伦敦:英国国家统计局。https ://www.gov.uk/govern 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39029/Taking_Part_2015_16_Child_Report_-_FINAL.pdf。访问日期:2024年12月10日。

英国教育部 (DfE)。(2013)。英格兰国家课程:体育教育学习计划。https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national-curriculum-in-england-physical-education-programmes-of-study/national-curriculum-in-england-physical-education-programmes-of-study 。访问日期:2024年12月10日。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Dery, D. (1998). 顺便一提的政策:当政策是其他决策的附带结果时
政策。 《公共政策杂志》,18,163-176 。
福特,E. (2018)。多塞特郡女学生因收到一封肥胖信而“失去自信”。https : //www.bbc.com/news/av/uk-england-dorset-42993144/dorset-schoolgirl-lost-confidence-after-fat-letter

富兰,M.（2001）。教育变革的新含义（第3版）。教师
大学出版社。
Gard, M. (2006). 健康与体育教育和“肥胖流行”。载于 R. Tinning、L. McCuaig 和 lisahunter (编),《澳大利亚学校的健康与体育教育教学》 （第 78-87 页）。Pearson。

Gard, M., & Wright, J. (2001). 管理不确定性:风险社会中的肥胖话语和体育教育。哲学与教育研究， 20(6),535–549。

Gard, M. 和 Wright, J. (2005)。肥胖流行:科学、道德和
意识形态。劳特利奇出版社。
Griggs, G.（编）。（2012）。小学体育教育导论。
劳特利奇出版社。
Griggs, G. (2015).理解小学体育教育。Routledge出版社。
Griggs, G., & Ward, G. (2012). 英国体育教育:脱节与重建。 《课程杂志》， 23,207–229。https : //doi.org/10.1080/09585176.2012.678500 Henebery, B. (2024年4月11日)。全球研究强调教师福祉的关键重要性。 《教育家》 。
https : //www.theeducatoronline.com/k12/news/global-study-highlights-critical-importance-of-teacher-wellbeing/284474

Hickey, C. (1995). 体育教育可以算是体育教育吗？ 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42(3),4-7。

杰弗里斯,B.（2023年4月23日）。露丝·佩里去世后,其姐姐称应暂停Ofsted检查。BBC新闻。https ://www.bbc.com/news/education-65339944 James, M. 和 Brophy, S. (2019)。学校是开展体育活动项目的关键场所 以下是如何让这些项目发挥作用。 《对话》。https ://theconversation.com/schools-are-a-crucial-place-for-physical-activity-programmes-heres-how-to-make-them-work-110215

Kervin, L., Vialle, W., Herrington, J., & Tony, O. (2006).教育工作者的研究。
汤姆逊,社会科学出版社。
柯克,D.（1993）。身体教育与文化 专著。迪肯大学
按。
Kirk, D. 和 Colquhoun, D. (1989)。健康主义与体育教育。英国
教育社会学杂志,10,417-434 。
科恩,A.（1992）。无竞争:反对竞争的案例。霍顿·米夫林出版社。
公司。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Leahy, D., O Flynn, G., & Wright, J. (2013). 健康与体育教育中批判性“批判性探究”的提议。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4(2)，175–187。

Lynch, T. (2005).昆士兰州1999年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课程大纲及政策制定在布里斯班三所天主教小学中的实施效果评估（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澳大利亚。https : //researchbank.acu.edu.au/theses/128/ Lynch, T. (2013). 小学健康与体育教育（HPE)教师:补充讨论。澳大利亚健康、体育与休闲委员会（ACHPER)《积极健康》杂志， 20(3/4)，10-12。https ://doi.org/10.13140/2.1.2889.6644

Lynch, T. (2015). 健康与体育教育（HPE）:在小学中的实施。 《国际教育研究杂志》， 70(c)，88–100。https ://doi.org/10.1016/j.ijer.2015.02.003 Lynch, T. (2016).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通过本地和全球社区伙伴关系优化儿童的健康和福祉。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https ://doi.org/10.1007/978-3-319-316 67-3

Lynch, T. (2017). 体育教育:通过运动和运动技能发展儿童的健康和福祉（第 77-94 页）。载于 S. Garvis & D. Pendergast（编），儿童时期的健康与福祉（第2版）。剑桥。

Lynch, T. (2023年7月31日)。英国国际学校:教师和学校领导是否合格?英国教育研究协会 (BERA)博客文章。https : //www.bera.ac.uk/blog/british-international-schools-are-teachers-and-school-leaders-qualified Lynch, T. 和 Soukup, GJ (2016)。“体育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全球术语混乱。 《 Cogent Education》， 3(1)，1217-1220。https ://doi.org/10.1080/2331186X.2016.1217820

Lynch, T., & Soukup, GJ (2017). 小学体育:学校领导对课堂教师质量实施的看法。Cogent Education, 1348925。https ://doi.org/10.1080/2331186X.2017.1348925 Nnyanzi, LA, Summerbell, CD, Ells, L. 等 (2016)。家长对一封报告儿童超重情况的信件的反应（该信件是英格兰一项常规国家计划的一部分）:来自对家长的访谈结果。BMC公共卫生，16，846。https : //doi.org/10.1186/s12889-016-3481-3经合组织。(2023)。PISA 2022 结果:概况介绍。新加坡。https ://www.oecd.org/publication/pisa-2022-results/country-notes/singapore-2f72624e/英国健康改善与差异办公室。(2024)。2023 年全国儿童测量计划:学校信息。https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national-child-measurement-programme-operational-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指导/2022年国家儿童测量计划学校信息

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2019)。政策文件:我们如何开展符合伦理的人员研究。https :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ofsteds-ethical-research-policy/how-we-carry-out-ethical-research-with-people# :~:text=Those%20carrying%20out%20research%20on,information%2C%20with%20the%20people%20involved

One Life Suffolk。(2017）。One Life Suffolk,一年回顾； 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年度报告。https : //www.healthysuffolk.org.uk/uploads/Onelife_Suffolk_A4_report.pdf Ornstein, AC, & Hunkins, FP (2017)。课程:基础、原则、

以及相关问题（第7版）。培生教育领导力出版社。

Penney, D. (2022).引言。载于 J. Stirrip & O. Hooper (编),体育教育、体育活动和健康中的批判教育学（第 2 章）。

劳特利奇出版社。

Pringle, R., Larsson, H., & Gerdin, G. (2019).体育、健康和体育教育批判性研究。Routledge 。

Quennerstedt, M., Burrows, L., & Maivorsdotter, N. (2010). 从教导年轻人健康到学习健康。Utbildning Och Demokrati, 19(2), 97–112。

Sandford, R. 和 Rich, E. (2006)。学习者与流行文化。载于 D. Kirk、M. O Sullivan 和 D. Macdonald (编)， 《体育教育手册》 （第 275-291 页）。Sage 出版社。

Sparkes, A. (1991). 课程改革:获得一种视角。载于 N. Armstrong & A. Sparkes (编),体育教育问题(第 1-19 页)。

卡塞尔教育。

Standley, N. (2024年1月6日)。Ruth Perry的妹妹因新任Ofsted负责人而“安心”。BBC新闻。https ://www.bbc.com/news/education-67893382 Steinbeck, KS (2001). 体育活动在预防儿童超重和肥胖中的重要性:综述与观点。肥胖评论， 2,117–130。

Stirrip, J. 和 Hooper, O. (2022)。体育教育中的批判教育学，
体育活动与健康。Routledge出版社。

Smith, A. (2013). 小学体育教育和运动教练:来自英格兰西北部学校体育合作关系研究的证据。

体育、教育与社会。https ://doi.org/10.1080/13573322.2013.847412

威尔士体育协会。(2015)。学校体育调查,国家现状:沉迷体育。http ://sport.wales/research--policy/surveys-and-statistics/school-sport-survey.aspx Swaine, Z. (2011) 医学模型。载于 JS Kreutzer、J. DeLuca 和 B. Caplan (编)， 《临床神经心理
学百科全书》。Springer出版社。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Thorburn, M.、Jess, M. 和 Atencio, M. (2011)。重新思考课程：分析苏格兰课程目标修订期间体育教育作为“健康与福祉”一部分的潜在贡献”。《体育教育与运动教学法》，16(4)，383-398。

Tinning, R. (2010).教育学与人体运动：理论、实践、研究。
Routledge出版社，《体育教育与青少年运动研究》。Routledge出版社。
Tinning, R.、Kirk, D. 和 Evans, J. (1993)。健康主义与日常体育教育。载于迪肯大学，《体育教育批判课程视角 读本》（第 77-94 页）。迪肯印刷服务公司。

Tinning, R., Macdonald, D., Wright, J., & Hickey, C. (2001).成为一名体育教师：当代和持久的问题。Pearson Education/
Prentice Hall。

Tinning, R., & McCuaig, L. (2006). 塑造特定公民：学校教育与健康与体育教育。载于 R. Tinning, L. McCuaig, & L. Hunter (编)，澳大利亚学校健康与体育教育教学(第 3-8 页)。悉尼：培生教育出版社。
英国研究诚信办公室。(2024)。什么是研究伦理委员会？ https ://ukrio.org/ukrio-resources/what-is-a-research-ethics-committee/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4)。
全球学校体育教育调查。https : //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2/002293/229335e.pdf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2024）。肥胖
和超重。https : //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obesity-and-overweight